

● 本版关注



### 用数学原理解读毛泽东军事思想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近日,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在北京图书大厦发布。北京阅读季邀请作者汪涛为读者上了一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数学原理”的公开课,引起公众强烈反响。

《超越战争论》通过全新的科学工具,完备地获得了可以准确描述战争过程的真实因果规律,从而将笼罩在战争问题上的迷雾彻底吹散,将一切战争的谜底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通过建立“战争循环因果序列”“战策循环因果序列”和“战争成本收益分析”三大数学模型,重新分

析、计算和解释了历史上的大量实际战例,建立起战争与和平的绝对条件和相对条件,从而为和平找到了最现实可行的途径。

在谈到为什么将“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数学化”这个问题时,汪涛解释道:“事实证明,只有科学的数学化工具,才可能长久地将人类思想成果精确地传承下去,并且不断得到改进和提升。中国2000多年前就有兵家圣典《孙子兵法》,但因其出现的年代早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不是采用科学的数学理论体系呈现,这样的兵家圣典并没有保证中国在近代有效抗击外来入侵者。”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汪涛著/东方出版社2016年7月版/52.00元

## 外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

关键词 民国 历史 他者

这是关于民国最完整、最系统的海外图文报道史料,原貌呈现《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这不仅仅是一段民国历史,更是一段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

他山之石

○余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副总经理副总编辑)

沈弘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推出了民国长卷,跟晚清长卷相比,这套书更有看点,在某种意义上,这套书是晚清长卷的升级版。晚清长卷的速写、绘画毕竟跟我们隔了一层,民国长卷以相片为基本的呈现形式。“镜头不会撒谎”,这样报道的民国是民国的真实。自然,拍摄者的眼光、心思影响了镜头的取景内容,其中会有偏见;对东方情调的猎奇和强化,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等等。但时过境迁,傲慢与偏见会烟消云散,镜头中的内容诉说着它本来的理智与情感,呈现出历史的意义。

晚清卷的中国无论有多少事件、紧张、屈辱,它在总体上是传统中国的缩影,其中有一成不变的民族性,老大、悲感、自得、精致等等。但进入民国的中国,处在“半殖民半封建”状态,事件真正成为事件,紧张真正变得紧张,屈辱也真正变得屈辱。这个升级版的中国,从自我满足的状态,一变成各种主义、思潮、中外势力角逐的大戏台。《伦敦新闻画报》对两个时代的中国的呈现,无论如何主观,仍把两种时代精神呈现出来了。如果晚清卷里的中国历史演进的步伐还显得模糊、晦暗不明的话,民国卷里的中国史几乎五年十年就能看到清晰的变化。

雷颐在序言里点明了一种阅读经验:一页页翻过去,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最多的是军阀和国民党人,偶有共产党的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的报道占居主流,但共产党的报道越来越多,最后一两年,有关共产党的报道开始占多数。军阀—国民党—共产党,政权的依次更迭,突然而至。1948年,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时刻了,有张照片令人印象深刻:一个硕大的信封,邮票一张紧挨一张密密麻麻,粗略数一下,贴了上百张,难怪要那么大的信封,邮票总面值上亿。原来是一封从中国寄往新加坡的挂号信,也就是说,印邮票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邮票的上涨。这种政权还有多少时日?尽在不言中。

《伦敦新闻画报》不是故意丑化国民党,在该书中,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有过光荣的时刻,无论是给蒋介石的镜头,还是报道北伐时国民党的锐气,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艰苦卓绝,都让人有一国新生的气象。但其兴忽焉,其亡勃焉。美、苏、英、中的四大国领袖之一,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在抗战后短短的三四年,就成为被通缉的“战犯”“全民公敌”,黯然失掉了政权。这其中的经验教训,雷颐说,“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

很多论者把民国史看作是一段动荡的历史,人们一度认为那是“黑暗”的中国;但随着社会近十年间对民国的再认识,我们知道“民国范儿”“超超

民国”一类的存在,我们知道民国是各种主义、思潮角逐的舞台,或者说,是中国以最开放的状态,接纳、试验各种主义思潮的时代。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与外,都在这一时代的平台上表现自己,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主义等等,都展示了自己的可能性。历史学家感叹民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试验了西方两百年来各种主义,但一般人难以想象这种试验是什么情形,读过该书的人多少能够了解一二。

我们看待民国的关键词是变化,《伦敦新闻画报》也展现了这种变化,但它的关键词更可能是“丰富”“混搭”。在我们以为必然如此的地方,外人有另外的角度。当年罗素来中国就感叹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一种混乱的自由。尽管新与旧有对立,甚至历史的变化也是新进旧



退;但在《伦敦新闻画报》的报道里,它们一起组成了中国社会的丰富性,传统与现代、中与外、摩登与保守、精英与底层,都自如地表达。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从开叉开到大腿的旗袍到中山装,如无后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见,民众的服装或者会跟邻国一样,呈现出民族服装与现代服装并存的格局。

尽管变化如此剧烈,但在外人的观察里,中国人有不变的一面。《伦敦新闻画报》一再对“天朝人”的平静进行报道,他们从普通人的面孔以及休闲等日常生活中认识到了中国人的心性;其实,不仅英国记者对此有印象,就是当年驻中国的美国人、俄国人也对中国人的老成持重、忍耐和超脱印象深刻。这种不变的生存,在今天对很多人来说,仍是一个谜。民国的开放性令人吃惊,阅读该书可让人理解今天社会开放的可能性,在开放与不变之间,在文明与认同之间,我们中国人一代代地写下自己的答案。这些解答对外人对后人都有教益。或者这也是《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的价值所在。

### ● 特别推荐

#### 我们为何读书?

我们为何读书?为了坚守内心的光明,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为了建立终生的信仰,为了追求生命的诗意与尊严。知名学者钱理群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读书治学经验,畅谈读书之要义,提倡为寻求真理而读书。《风雨故人来——钱理群谈读书》收录其读书之道,书中文字时而对青年学子谆谆相告,时而带我们走进鲁迅、周作人等文化大家的读书生活,以期给读者一把获取知识和智慧的钥匙。他提倡具有精神深度的个性化阅读,提出要沉潜到历史的深处、文明的深处、生活的

深处、人性的深处,从而获得生命之重。他建议“读书、思考、写作、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的这一部活书。阅读之所以能够起到对人的提升作用,就在于它能帮助人超越自身生活、眼界、知识、思想的局限,进入一个未知的,却又是人所向往的,更为自由的天地。(倩)《风雨故人来——钱理群谈读书》钱理群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7月版/4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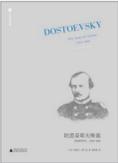
### ● 书与人

#### 戴维斯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泛滥。一天早上,国务卿召见小约翰·帕顿·戴维斯,把他开除出国务院。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二战期间,这位职业外交官提醒美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将取得统治权——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包括戴维斯,身陷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旋涡中,并且深受迫害。美国也因此失去了整整一代的东亚外交官和东亚问题专家,失去了他们的智慧和指导。戴维斯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20世纪初出生在中国,主要在美国接受教育。20世纪30年代,他加入了刚刚成立的驻外事务处,重新回到了中国,并且自此一直在中国工作到二战胜利前夕。在中国工作期间,他成为了第一批和中国青年革命家毛泽东打交道的美国人。戴维斯曾担任史迪威将军的政治助手,史迪威将军是东亚和南亚联军战时统帅;因而,戴维斯得以游历东亚和南亚,与殖民地时期印度的尼赫鲁和甘地会面,判断他们会不会因为敌视英国而转而支持日本。戴维斯曾在莫斯科与乔治·F·凯南共事,并且成为了一生的朋友,后者是美国对苏政策的缔造者。但是,两人都没有逃过战后美国肆虐猖獗的“反共浪潮”。《未了的中国缘:一部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版)是戴维斯的自传,他以智慧向我们展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用散文式的语言讲述了战争后期波诡云谲的战略形势。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行动者也是那个时代的观察者。

#### 约瑟夫·弗兰克



1976年至200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瑟夫·弗兰克用25年时间完成的恢弘壮阔的5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被公认为是世界范围内最权威厚重的陀传。弗兰克站在列昂尼德·格罗斯曼、阿·谢·多利宁等先驱学者的肩上,并利用英语世界得天独厚的文学史及传记撰写经验,成就了这部伟大的传记,它配得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伟大作品。《受难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作为第二部,描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0年代的艰难历程。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受难的年代里进一步巩固了“反叛的种子”,苦役与流放并没有击垮他,通过“西伯利亚小说”的写作,他顽强地保持着与俄国文坛的精神联系,直到1860年代初重返俄国文坛。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认真的恋爱、婚姻等事件都发生在本卷描述的年代里,使得该书在评传的体例里有意增加了传记的成分,可读性很强。通过该书,弗兰克向我们证明,他不仅是当今最优秀的作家传记家之一,也是罕见的洞幽烛隐的批评家。

## 国学大师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 文化传承 文化自信 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到底怎样才能读懂。金克木有着惊人的披沙拣金的能力,他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其情也真,其言也善,从中可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



#### 金克木(1912-2000)

出生于江西。著名学者、文学家、翻译家。一生经历传奇,1930年代赴北平求学,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在北京大学当过图书馆管理员。后来辗转各地,做过记者、教员。1943年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教梵文、巴利文、印地语等。金克木不仅精通多种语言,而且学贯中西,在国学、中外文化交流学、比较文学等方面也颇有建树。著有《蝙蝠集》《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巢痕》《文化的解说》《旧学新知集》等。2000年8月,金克木逝于北京,临终遗言:“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中国文化老了吗?》金克木著/中华书局2016年7月版/48.00元

#### 名家名作

○荆墨(书评人)

金克木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学者,被誉为“燕园四老”之一。只是金先生的学历可不怎么样,他只上过一年中学,论文凭,不过是小学毕业而已。小学生而能成一代大家,自然是奇才。不过在金克木自己那里,更看重的,不是所谓才能,而是自学的精神与动力。现在读到金先生的《中国文化老了吗?》,了解到先生有着深厚的文化情怀,并从中读到了国学大师的文化自信。

金克木是一位有趣的人,明白的人,不管寂寞与否,他始终以一种“老顽童”的心态与姿态,挑战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到底怎样才能读懂。在《中国文化老了吗?》一书里,金先生以惊人的披沙拣金的能力,拨开重重迷雾,呈现传统文化内核。这其中他寻找到的文献之根,有他对“无文”文化的深隐,有他对历史人物的论述,而这也是该书的三条脉络。书中,金先生凭借过人的智慧,为读者开掘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内涵,有助于激发人们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活力之所在。字里行间,丰富的情感,浓郁的诗意,带给人们不尽的遐思与感动。

传统是什么?金先生说,传统即是从古时一代又一代传到现代的文化之统。这个“统”有种种形式改变,但骨子里还是传下来的“统”,而且不是属于一个人的。金先生将传统文化分为两部分,一是看得见的、有文献记载的“显文化”,亦即有文的文化;二是看不见的、缺少文献记载的“隐文化”,亦即无文的文化。前者多为官方所阐发,以雅文化为特征,形成有文文化的主体,象征着社会的主流文化;后者多为民间所传承,以俗文化为特征,却是世俗生活的皈依,代表着普遍的民俗心态。两者既彼此融合,又各自独立,既缺一不可,又互为表里,无论偏重哪一面,都无法认清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

金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不是相对

立的关系。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特色是哲学式的省思,那么中国文化的特色则是艺术式的审美。中国是一个艺术的国度,汉族的文化传统是艺术的,思维方式是艺术的,中国人喜欢用“艺术”的眼光看世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即应该重视中国的艺术观。文化的传承既有衰减,也会僵化,但不管是衰减,还是僵化,思想的自由探讨总会因定于一尊而中断……欲真正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就需要双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齐步前进,随时问答,才能进入角色,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金先生的智慧让人深深着迷,在他身上也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学术关怀。比如,金先生认为,“古书可以当作现代新书。想把自己古代化,书就难懂。想把古书古人现代化,那就不难懂。”古人也注意到这个“学以致用”以及如何“学以致用”的问题。宋代大儒陆九渊之名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古书有可能被“挂羊头”,卖的却是今人的“狗肉”。因之金先生说,“《论语》不好懂,解说随着时代而变化”。中国传统老了吗?书中并没有给出答案,或者说答案就在我们身处的当下之中。身在此山,就看看登山人的眼界是否够宽广,想要攀登的位置是否够高了。

金先生最初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小馆员,但他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广为拜师,勤奋自学。此时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他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借回去的书。金先生的智慧,有与生俱来的成分,也和他特殊的生活阅历人生体验有关系。但是,金先生的智慧何以洋溢着摄人心魄的神秘?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金先生晚年对自己有一个定位,他说:“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金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其情也真,其言也善。我从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对先生,敬佩不已。

## 小森阳一与《矿工》的格斗

关键词 阅读事件 文本分析 他者意识

夏目漱石的小说《矿工》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在召唤阅读的事件性的十分稀有的文本。小森阳一对《矿工》的文本分析,展现了阅读《矿工》过程中生动的事件性。

#### 文本分析

○沈清清(南京大学日语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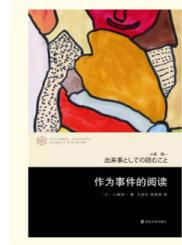
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的自我意识开始介入文本的那一刻,便是表述者与读者相遇、同时在场的开始。表述者曾经写出的语句,进入了读者的意识空间,由此生成意义;同时曾经存在于读者意识中的语句,被投企到了表述者所组织的文本场域当中,这个原本完整的时空连续体场域,由此出现了瞬间的扭曲与突起——这里发生的就是事件。

夏目漱石的小说《矿工》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在召唤阅读的事件性的十分稀有的文本。该小说于1908年1月1日至4月6日连载于《朝日新闻》,讲述一位对生活失去兴趣、想要寻死的19岁的东京优等生,偶然被“棉袄”(代指一位穿着棉袄的男子)搭讪。“棉袄”以“反正得干活的是吧”为开端,反复诱导主人公“自己”同行,“自己”在逐渐被“棉袄”的价值系统异化的过程中,放弃“死”的念头以及业已建立的价值评判系统,明白并接受“自己”是要去当矿工的事实。夏目漱石没有采取传统的第一人称追忆式小说的写法,而

是将写作时间设定在作品内部,使得创作者与主人公保持一致。

日本著名文学批评家、东京大学教授、左翼学者小森阳一对《矿工》的文本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析,通过对阅读过程中被当作不言自明的“主体”的形成与他者、欲望的生成与自我、意识的连续与转换进行自我,展现了阅读《矿工》过程中生动的事件性。而伴随着方法批判展开的是小森深刻的思想批判:其阅读《矿工》的行为整体是一个撼动、摧毁总体话语系统的过程,该系统是以同时代的话语体系和新闻传媒为中心逐步形成的,统治着所有的印刷媒体。可以说这个过程“即便对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末的人,同样提出了某种哲学意义上的命题”。

小森强调,分析阅读的事件性问题,会因为读者之间存在个人差异而困难重重,该书只针对其个人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汇报,而这不过是众多可能性当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并且是一次性的。读者读完此书,或许应该有一些启发:阅读不该只是对内容的关注和轻信,我们首先要具备对文体的敏感,培养一种把阅读当作“事件”来看的想象力和批判力。



《作为事件的阅读》小森阳一著 王奕红等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32.00元